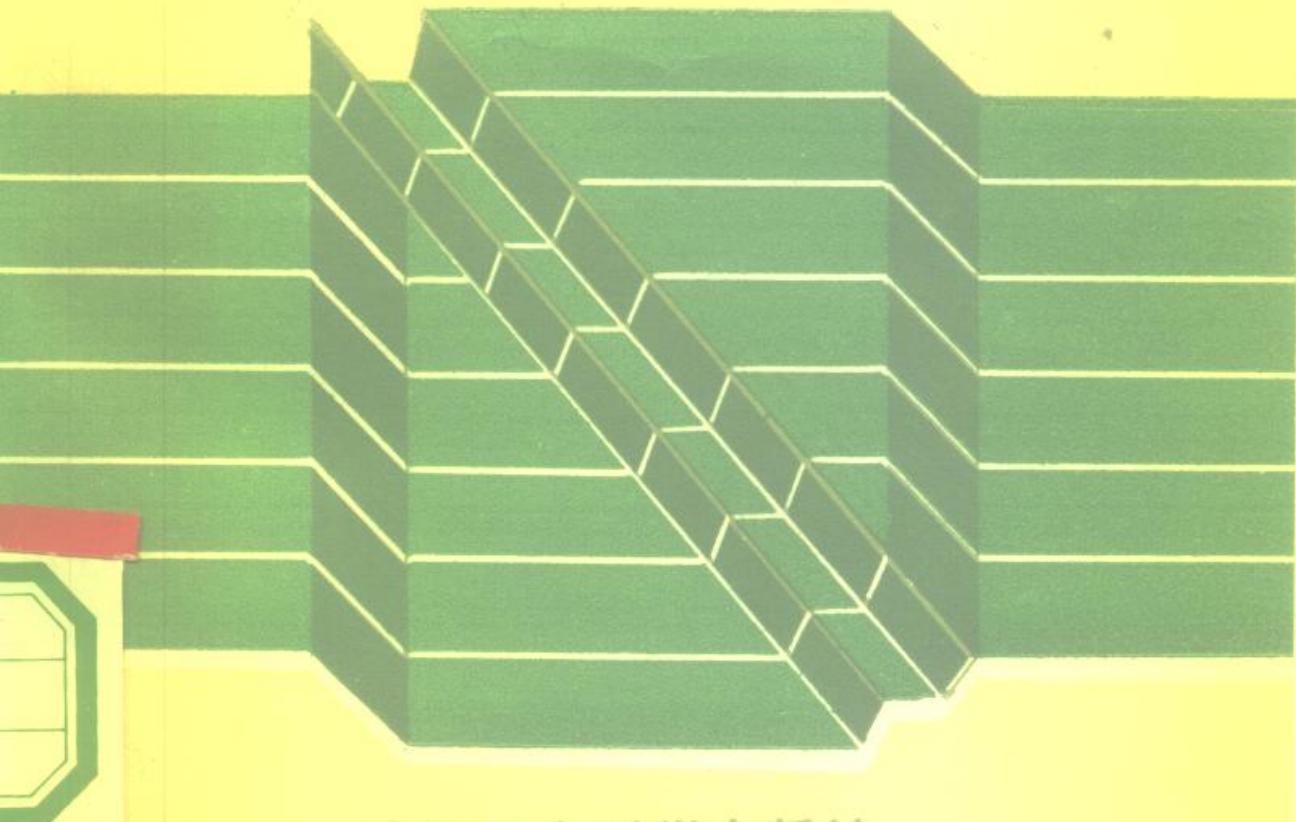


中国农村 工业化道路

ZHONGGUO NONGCUN GONGYEHUA DAOLU

陈吉元 韩俊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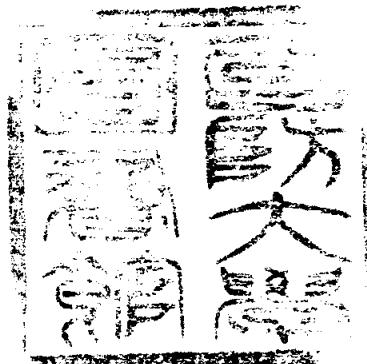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0 4415 4

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

陈吉元 韩俊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0 4415 4

(京) 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陈季东

责任校对：相臣

封面设计：陈圣西

版式设计：张汉林

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

Zhongguo Nongcun Gongyehua Daolu

陈吉元 韩俊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编码 100720 电话 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遵化市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68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5004-1210-X/F·230 定价：8.80元

61

本书各章作者

陈吉元	绪 论
韩 俊	第七、十、十二章
孔泾源	第一、二、三章
陈乃醒	第四、八章
吴建光	第五、六章
秦少相	第九章
姜百臣	第十一章
荆建林	第十三章

此书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绪 论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	(1)
第一章 中国农村工业的历史概观	(7)
第一节 由来已久的农村工业及其特性.....	(7)
第二节 19世纪后半期中国农村工业的初步变化.....	(15)
第三节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村工业的兴盛与衰落.....	(25)
第二章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40)
第一节 农村工业与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基础.....	(40)
第二节 建国初期农村工业的发展概况.....	(46)
第三节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工业概况及其局限性.....	(53)
第四节 新时期的农村工业化高潮.....	(59)
第三章 农村工业化与中国的现代化	(63)
第一节 农村工业的演进与工业社会的来临.....	(68)
第二节 农村工业的效率基础与农村工业化的产业演进趋势.....	(81)
第三节 二次工业化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87)
第四章 中国农村工业发展政策的演变	(95)
第一节 农村工业的所有制政策.....	(95)
第二节 农村工业的资金供给政策.....	(101)
第三节 农村工业的市场流通政策.....	(105)
第四节 农村工业的管理体制.....	(108)
第五节 农村工业的劳动工资政策.....	(111)
第五章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增长模式	(116)

第一节	引言	(116)
第二节	乡镇企业增长率的波动	(118)
第三节	乡镇企业增长问题的理论分歧	(123)
第四节	乡镇企业增长的经验统计分析	(125)
第五节	乡镇企业增长模式的选择	(136)
第六章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非典型产业结构	(144)
第一节	乡镇企业非典型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增长的贡献	(144)
第二节	乡镇企业非典型产业结构的形成机理	(158)
第三节	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转换中的障碍与矛盾	(163)
第四节	产业结构变革：乡镇企业新成长阶段	(168)
第七章	双重工业化格局与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	(174)
第一节	双重工业化格局	(174)
第二节	横向分工：农村工业主导部门选择及结构优化	(179)
第三节	纵向分工：城乡工业的一体化发展	(187)
第八章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运行机制	(192)
第一节	两种迥然不同的经济机制	(192)
第二节	中国农村工业运行的市场机制	(195)
第三节	构建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农村工业运行机制	(203)
第九章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微观组织与制度的区域性特征	
		(207)
第一节	农村工业化微观主体选择的地区性差异	(207)
第二节	农村工业化微观主体选择的区域经济背景	(213)
第三节	区域文化背景与农村工业化微观主体选择	(219)
第四节	农村工业化微观主体行为的区域性特征	(226)

第十章 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农村人口城市化	(237)
第一节 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难题	(237)
第二节 农村工业化与小城镇的发展	(240)
第三节 农村人口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256)
第四节 农村人口城市化机制的变革	(266)
第十一章 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	(272)
第一节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生态环境影响	(272)
第二节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工业化健康 发展	(277)
第十二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工业化	(286)
第一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村工业化发展概况	(286)
第二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村工业化的背景及动 因	(290)
第三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村工业化的影响及后 果	(299)
第四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村工业化前景展望	(306)
第十三章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工业化	(310)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背 景	(310)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村工业化的现状与特 征	(312)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村工业化的宏观管理： 组织与政策法规	(318)
第四节 结论与启示	(325)

绪论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

社会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都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阶段。虽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以后，进入20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民族工业也有微弱的发展，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统治下的旧中国，始终没有具备也不可能具备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经济条件。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才争得了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并进而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权力。

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通过建立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动员和积累了大量资金，迅速推进了我国规模庞大的工业化进程。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由2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左右，初步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我国工业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于战胜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保证我国的政治经济独立，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从1949年到1978年通常称之为的国家工业化，其实并未覆盖全国，主要是在城市进行，因而就其实质来讲，是把广大农村排除在外的城市工业化。这样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一个后果，即进一步强化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但是，中国农村没有也不可能置身于工业化之外。中国

农村工业化任务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虽然我国农村工业在50年代以后已有发展，但应该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正式揭开了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序幕。在我国农村，非农产业，即70年代前的社队企业和80年代后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所谓艰难，一是因为我国特别是农村的自然经济基础特别深厚，因而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受到自然经济的巨大束缚；二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左”的倾向，把农村非农产业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想方设法予以限制或割掉。所谓漫长，指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极为缓慢，历经反复。先是在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作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农村非农企业，几乎全部被消灭了。以后又在农村贯彻“以粮为纲”的产业指导方针，进一步砍掉了一些非农产业。即使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化进程中幸免于难的非农产业，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多年中，也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在经济缝隙中顽强挣扎，数量很少，发展很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乡镇企业命名的农村非农产业，包括农村工业，才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8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虽然也经历过某些曲折，但是从总体上看，乡镇企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乡镇企业在我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90年我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已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25%，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7%。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万亿元以上，比1978年增加20多倍。需要指出的是，乡镇工业企业一直是乡镇企业的主要组成部分，10余年来发展最快，现在乡镇工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1/3$ 以上。到1990年底，乡镇企业已安排了92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现在，乡镇企业已成为我国商品市场的重要供应者，是国家财政收入、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是支农、建农和建设中小城镇

的重要力量。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载体，是我国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桥梁。这是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的主要特色所在。

在今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乡镇企业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首先，我国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乡镇企业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也有赖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其次 在农村实现90年代的小康目标，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镇企业的发展。第三，优化农村就业结构，进一步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也主要依靠乡镇企业的发展。第四，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城市化目标的实现，今后将主要通过在农村新建中小城镇，这也将主要依靠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民自己集资。最后，在实现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本世纪末把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任务中，乡镇企业也将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农村工业化面临着的情况和问题，往往超出我们以往的经验，这就需要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现在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很多，这里只提两个：

一是需要研究如何处理好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虽然从根本上说，二者是互补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但在一些方面，二者又存在着矛盾。譬如，在新阶段社会经济条件下，从事农业与从事乡镇企业工作的劳动者之间在经济收益上存在着很大差距，成为农业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的巨大推动力。尽管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转移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也要看到，在某些地区，特别是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农业劳动力向乡镇企业的转移还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从而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甚至发生土地撂荒的情况。虽然十几年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是空前的，但目前就全国情况看，农业劳动力向农外转移不是过度，而是还很不够；由于盲目性转移从而导

致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只是个别地区的情况。因此，对现阶段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状况必须有一个清醒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估计。今后既要加强农业劳动力向农外转移的宏观指导，尽可能减少盲目性，又要继续积极安排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不能因为个别地区发生的问题而因噎废食，怀疑甚至反对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大方向。不言而喻，今后各地一定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科学的规划，积极而又稳妥地逐步实现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的目标，在推进农村工业化的同时，保证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做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但要为此而积极努力。

二是需要处理好乡镇工业与城市大工业的关系。从根本上讲，二者是互补的，可以相互促进。但是，实践表明，二者也是有矛盾的，特别是在能源、原材料紧张的情况下，乡镇工业与城市大工业往往在这方面发生“争”和“挤”的矛盾。为了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现在既要努力增强城市大工业的活力，又要大力发展农村工业，这是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可缺少的两翼。今后无论二者之间发生什么样的矛盾或摩擦，都不会也不可能再提出要谁不要谁的问题，而是要全面分析产生矛盾的原因，研究解决矛盾的途径。过去在二者发生矛盾时，一方总是指责另一方吃“偏饭”。随着今后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情况将会越来越少。要把城市大工业与农村工业真正置于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这一“起跑线”就是市场。同时，对二者的发展，也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制订科学的规划，进行必要的指导。调整产业结构，使其合理化，是使二者由互争变为互补的一个重要方面。本着生产布局经济合理的原则，今后农产品加工要更多地由乡镇企业来承担；在城市经济辐射作用能够达到的地区的乡镇企业，要多与城市大工业协作，为其生产必要的零部件。这样，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就能合理分工，取长补短，互助互利，共同发展。

十余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乡镇企

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一支不可取代的重要力量。可以预期，今后我国农村工业化进程不可能再发生逆转，但困难和曲折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所走的道路是不平坦的，然而从我国农村沃土中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业已揭开序幕的我国农村工业化舞台，今后将会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好戏，为在我国跨越温饱奔向小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上的一系列难题，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现在完成的这部专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本书共有十三章。第一章运用大量历史资料，对20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传统农村工业的产生、成长、兴盛及衰落的艰难曲折历程作了描述和分析。第二章着重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进程。第三章则着重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农村工业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第四章分析了中国农村工业发展过程中若干重大政策的演变。第五章通过对我国乡镇企业增长轨迹的经验统计分析，探讨了乡镇企业增长模式的转型问题。第六章探讨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特征及其形成机理，并对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变革中的矛盾与障碍以及产业结构变革的特征进行讨论。第七章则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合理的分工，实现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第八章分析了中国农村工业独特的市场运行机制及其功能，并探讨了农村工业运行机制的进一步优化问题。中国农村工业化微观主体的选择在不同地区存在很大差别，第九章着重从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角度对此进行剖析。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第十章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第十一章简要讨论了农村工业化的环境影响及相应回策。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则分别对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工业化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力图为研究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提供一

个国际参照系统。

本书得以完成，是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指导与支持分不开的，在这里要特别向周明俊、金泓同志表示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和其他条件的限制，本书存在缺点乃至错误在所难免，敬请经济学界同行及广大实际工作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中国农村工业的历史概观

第一节 由来已久的农村工业及其特性

人类的产生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可以说原始制造活动是与人类社会同时起步的，因而工业制造的发端，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原始人类通常以采集和狩猎两种形式谋取自己的生活。男女之间依据生理特征而分别进行的狩猎与采集活动，形成了母权制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原始分工无疑有它的自然基础。自然分工的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分工的产生。到野蛮时代中期，采集和狩猎的原始分工，发展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此后，原始农业经由刀耕火种、耒耜耕作发展为铁犁耕作，同时有了其它农具和日用品制作以及纺织。新的社会分工又开始了，一部分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去。社会分工的发生，并不意味着自然分工的终结，不仅畜牧业和手工业作为农业的副业在各个农耕民族的经济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确立了新的自然分工形式，即男耕女织。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便成为传统农耕社会的一种基本经济结构。

在农耕社会中，手工业的存在方式或发展程度取决于自然经济内在矛盾的历史性质。众所周知，生产与消费在一个经济实体内部的直接结合与统一，是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但当人们脱离自然等同状态之后，自然经济就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而存在。这是由生产的局限性与需要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

自然经济机体内部所潜在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不仅是传统

手工业产生的内在原因，而且还规定了传统手工业与农业的离分具体形式。普通民众的某些生产与生活必需品不能在家庭内制作，由此产生了一般手工业；富裕阶层的奢靡消费则需要奢侈品手工业。因此，手工业的产生，既是自然经济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又是暂时或部分地缓解这种矛盾的手段。但在生产与消费直接结合的耕织经济结构尚占统治地位时，几乎界定了手工业发展的范围和程度，即始终作为耕织经济结构的补充要素而存在，因而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业，本质上都是农村工业。这种情形，已为世界范围内农耕民族的整个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所证实。自然经济的真正解体，最初也只能从耕织经济结构内部开始。

农耕结构的分解，一方面表现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手工业（一般说，主要是纺织业）中商品生产的增长及其本身的分离、独立和发展。但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并非完全一致，不能等量齐观。以纺织业来说，纺织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产业革命发生初期，具有其特殊的先导性。在商品经济与国民收入渐次增长的早期阶段，纺织品的需求弹性大于食物与工矿产品；纺织活动不象农业或工矿业那样易于受到土地或自然资源的私有杈乃至经营权的控制与垄断；纺织活动易于促成稳定性生产组织或工场手工业的普遍发展以及相应的规模经济；此外，纺织生产周期短，资本周转快，赢利和积累相对容易一些，等等。

东西方农耕社会的经济结构，都是以耕织结合为基本特征的，但由于地域自然分工的差异与人们生产活动的结果，农耕结构尤其是作为技术与经济变迁先导产业的纺织业依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深刻地影响着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中国的农耕经济，在棉花引进以前，是种植业与麻纺织业和种植业与丝织业的二重结合。中国是丝的祖国，但麻很可能早于

丝，至迟新石器时代民间已开始生产葛布。麻是中国早期社会一般民众的主要衣物原料。《诗经》中提到麻的有数十处。当然，《诗经》中提及桑或丝的次数亦不下于麻葛。但丝终究只归富裕阶层享用。民间织丝，或是为了纳税，或是用以交换包括麻制衣物在内的生活必需品或生产资料。因此，中国早期的农耕经济，尽管由于自然分工形成了农桑结合与农麻结合两种形式，但就农民家庭的实际消费而言，农麻结合是其基本内容。自然经济的潜在矛盾，在这里一方面表现为生产的二重性与消费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即农桑之家需要经历一个以市场为媒介的由丝到麻的转化过程。中国早期的自然经济生活中，一方面需要较多的简单商品作经济媒介；另一方面表现为劳动产品的自然属性与生产者的生活需求不尽吻合的矛盾，例如以麻为原料的纺织品御寒能力较低，加以中国农耕经济中畜牧业的比重本来就很小，对处于温带的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说，始终面临着一个寻找更为保暖的纺织原料问题，这也就是后来发生的棉麻更替过程。

棉花的种植与传播，主要是在宋元之际，完成于明清时期。植棉业及棉纺织业的不断扩张，逐渐取代了丝、麻等原料在纺织业中的主导地位，成为一般民众衣被所需的基本原料。随着棉麻的更替，中国的耕织结构便由农桑、农麻的二重结合趋向单一的农棉结合。自然经济的潜在矛盾有所缓解，自然经济结构则较前期更为紧密。当然，在棉织时代，丝麻制品也并未完全退出纺织业，只是麻织品所占比重极小，无关宏旨；丝织品虽朝着专业性生产发展，但仍属于富裕阶层的消费对象。

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中纺织业的历史特点及其变迁过程，给农耕时代的技术与经济变迁带来了深刻影响。纺织业的基本生产工具是纺车和织机。仰韶文化，中国已有砖纺，至西汉时，发明了单锭手摇纺车。三锭足踏纺车的采用，不会晚于东晋。元代王祯《农书》上则画有五锭足踏纺车，一天可纺麻二斤。他还画有32锭大纺车，昼夜可纺麻100斤。这种大纺车的纺锭平列车底，

以皮弦带动，有左右飞轮，以人、畜或水力作动力，俨然是一部纺纱机，当时江南苎麻之乡凡临江河处多置之。棉麻更替后，由于棉花是短纤维，接条多，费工时，当然不能简单地采用多锭麻纺车，结果便由黄道婆介绍，以“引进”的形式复古了西汉时即已出现、元代依然存在的单锭手摇纺车，并成为家庭纺纱业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技术手段或生产工具。纺织技术尤其是纺纱技术又重新回到了它的遥远的历史起点。单锭手摇纺车的生产效率，只相当于水力大纺车的 $1/300$ 左右，或相当于多锭足踏纺车的 $1/6$ 。导致纺织业的这种技术倒退与发展迟滞的直接原因，是劳动对象的自然属性的差异，使得人们不能简单地采用原有的生产工具；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棉花的自然属性及单锭手摇纺车对农耕经济的目的、农家经济条件和农业经营特点的适应性。结果是，中国的耕织结构较前期更为紧密，直到西方资本列强问鼎东方时，农业基本经济结构中的纺织业即棉纺织业还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并且尚不具备产业独立化的条件。基于当时的市场状况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商业资本也很难发展起来。因此，尽管当时其它行业或许存在人们所称为的“资本主义萌芽”，但真正能够自发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种萌芽要素或产业基础，在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中却根本就不存在，农村家庭手工业还依然只是传统农耕结构的补充要素而已。

当然，中国也有从农耕结构中分离出来的纺织业即丝织业，但丝织业的分化，并不意味着自然经济结构的松解。首先，种植业与丝织业的结合，历来只是形式上的结合。实质上的结合，早期是农业与麻纺织业的结合，后来则是棉纺织业取代麻纺织业而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丝织业的分化，并不等于耕与织的分离。其次，丝织业专业化的技术成果，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为棉纺织业所吸收。棉纺织业中最关键同时也是最困难的工序是纺纱，但在丝织业中却是以缫代纺，恰恰是最简便的工序。再次，专业丝织所派生的商品经济关系，并不引起耕织自然经济性质的改变。农桑